

「銘文重合法」對商周青銅器銘文

辨偽研究的有效性

——以魚尊及其相關器物銘文考證為例

崎川隆*

一、日本收藏兩件「魚作父庚彝」尊

《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簡稱「集成」)收錄兩件帶同樣銘文的尊形器，書中將其分別稱作「魚作父庚尊」(《集成》05801)和「魚尊」(《集成》05833)。¹為了行文方便，下面將其分別稱作「A尊」(前者)和「B尊」(後者)。A尊現藏於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其器影照片曾著錄於《泉屋清賞·彝器部》、《海外吉金圖錄》等圖冊中。²B尊原為日本京都私人收藏，現已下落不明。A、B兩尊銘文均為兩行五字，其內容完全相同，《集成》釋文將兩尊銘文均釋作「魚乍(作)父庚彝」。通過對兩尊銘文的互相比較我們較容易注意到：這兩篇銘文不但其記載內容完全相同，而且其字體書寫風格、文字大小、行款佈局等細節特徵也彼此相當接近(見圖1)。

* 崎川隆現職為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副教授。

¹ 關於文中所引金文著錄書的簡稱及出版、版權信息，請參文末「引書簡稱」。

² 參看《泉屋清賞》(京都：住友氏刊，1919年)第23圖、《海外》第67圖。



圖 1

但遺憾的是，由於《集成》所錄 B 尊銘文拓本模糊不清，幾乎看不到銘文第一個字的上部筆畫，對兩銘字形的比較帶來一定的困難。我們根據《集成》卷末的拓本的來源信息可以知道，此銘文最原始的拓本曾經著錄於 1959 年由梅原末治編印的《日本蒐集支那古銅精華》（以下簡稱「日精華」）中（見圖 1）。³此張拓本字跡非常清晰，而且圖版印刷質量也相當精良，可以辨識到每一字的字形和筆畫細節。通過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在「魚」字和「乍（作）」字中間以及「乍（作）」字下層可以看到與這篇銘文無關的一些筆畫，似是另一篇銘文。那麼我們根據這張拓本將對 A、B 兩器銘文重新進行仔細比較。通過比較可知，A、B 兩銘除了 B 器銘文下層的一些筆畫以外，就其餘五個字而言，無論在字體大小上還是字距、行款上，其特徵互相高度一致，甚至兩銘可以互相完全重合（見圖 2）。在兩件不同器物上出現的銘文在字體、行款的細節特徵上如此完全重合，對於這一現象我們應該如何解釋？

³ 參看《集成》（修訂增補本）第 5 冊，頁 4410；梅原末治編：《日精華》（大阪：山中商會，1959-1962 年）第 2 冊，第 155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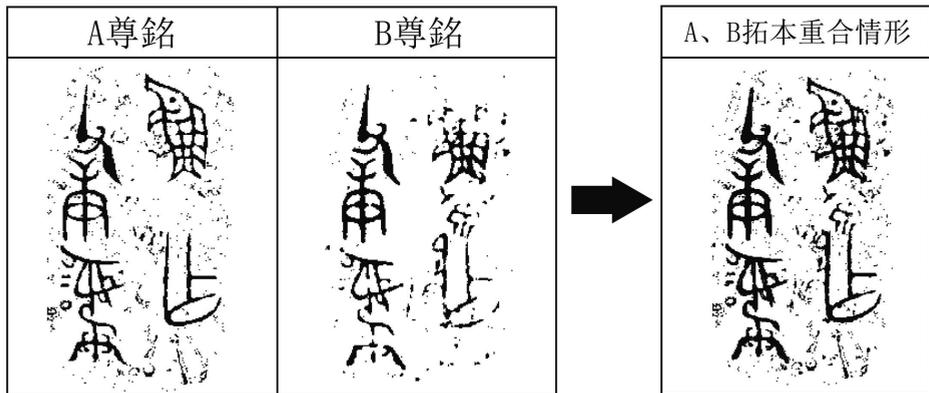


圖 2

二、商周青銅器銘文材料中的「同銘器」

在商周青銅器銘文材料中，在不同的器物或同一件器物的器、蓋上出現相同內容銘文的情況比較常見，例如：亞址觚（《新收》198-207，見圖 3 上段）、亞址角（《新收》208-217，見圖 3 下段）、癩簋（《集成》04170-04177，見圖 4-1）、追簋（《集成》04219-04224）、史頌簋（《集成》04229-04236）、善夫梁其簋（《集成》04147-04151）、棚生簋（《集成》04262-04265）、小克鼎（《集成》02796-02802）等，學術界一般將其稱作「同銘器」。這種同銘器雖然在其內容上相互完全相同，但就其字體大小、文字佈局（包括字距、行距、各個文字之間的相對位置等）、文字傾斜度等細節特徵而言，每一篇銘文都有出入，彼此完全可以重合的情況非常少見。⁴例如圖 3 所示的「亞址觚」和「亞址角」分別有 10 件鑄有同樣銘文的器物，但其中沒有一對完全可以重合的銘文；圖 4-1 所示 8 件「癩簋」的器、蓋銘文雖然它們的銘文內容相互完全一致，但通過每一件銘文字形的仔細觀察和比較可知，其中沒有一對可以彼此完全重合的銘文（見圖 4-2）。此外，在器、蓋對銘器物的器銘和蓋銘之間也幾乎看不到可以重合的情況（見圖 5）。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肯定，至少就東周之前的金文材料而言，除了真偽有疑問的材料以外基本不見彼此可以完全重合的銘文。⁵

⁴ 關於同銘器之間的字體差別問題，可參李峰 Li Feng：“Ancient Reproductions and Calligraphic Variations: Studies of Western Zhou Bronzes with ‘Identical Inscriptions’”（《古代的複製和書體的變異——西周同銘青銅器研究》），*Early China*22（1997 年）。

⁵ 到了東周以後，在青銅器銘文鑄造工藝中就開始出現利用同一模件翻印多數鑄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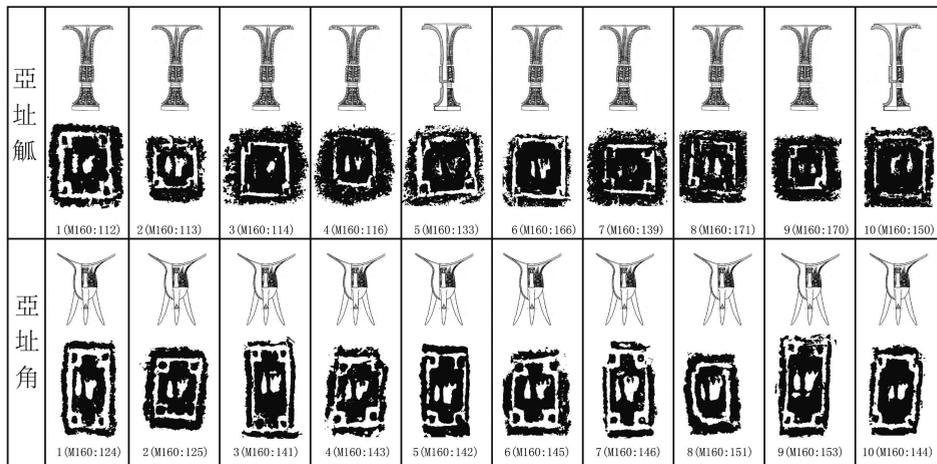


圖 3



圖 4-1

技法（其中包括單字模、複字模、全銘模等），例如春秋早期的「宗婦諸器」（《集成》02683-02689、04067-04087、09698、09699、10152）、春秋中期的「秦公簋」（《集成》04315）、戰國中期的「曾姬壺」（《集成》09710、09711）等。關於東周時期鑄造銘文的機械複製問題，可參吉開將人：〈曾侯乙墓出土戈戟の研究〉，《東京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研究紀要》第12號（1994年）；吉開將人：〈先秦時期における單字模鑄造法について—曾侯乙墓出土青銅器群を中心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9冊（1995年）；Noel Barnard 巴納：“A Lid Core with Intaglio Inscription; and a Re-appraisal of Methods of Casting Inscriptions”, Appendix A, *The Shan fuliangch'i Kuei and Associated Inscribed Vessels*《善夫梁其簋及其他關係諸器研究》，頁215-268，SMC Publishing Inc（1996年）。另參林已奈夫：〈殷周青銅器銘文鑄造法に關する若干の問題〉，《東方學報》第51冊（1979年）。

	第1器	第2器	第3器	第4器	第5器	第6器	第7器	第8器
癩								
皇								
其								
佩								

圖 4-2

	4977	5134	5135	4874	4882	4734	5104	4838	4707	4745	5128	5148	5410	5357
器影														
蓋銘														
器銘														

(說明：資料號碼均為《集成》器號)

圖 5

從這一現象我們可以肯定，至少在東周之前的鑄銘工藝中，即使當需要複製多件同樣銘文鑄範時也基本不採用以印模翻印為代表的機械複製方法（即圖 6 中的「方法 A」），而每一篇銘文鑄范卻是由手工一個個複寫過來的（即圖 6 中的「方法 B」）。所以，我們反過來可以這麼理解：如果在東周之前的鑄銘材料中出現兩篇（或多篇）互相可以重合的銘文，那麼至少其中一篇（或多篇）應是偽作或重複著錄等不原始的材料。那麼，在這裡討論的 A 尊銘和 B 尊銘到底哪一方不是原始的銘文？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

已經知道：A、B 兩尊銘文明顯是在不同的器物上出現的，而且 B 尊銘文下層還出現另外一篇銘文的字跡，因此，我們可以肯定這兩篇銘文至少不是重複著錄的材料。若此，哪一方是偽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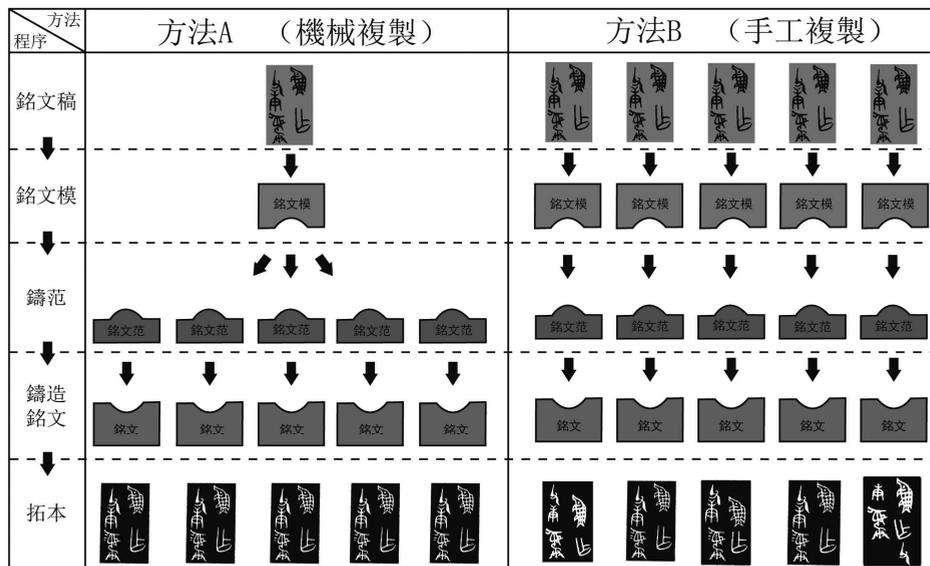


圖 6

三、A、B 兩銘孰真孰偽？

A 尊現藏於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據該館記錄可知此尊入藏時間為 1917 年 11 月，之後到現在一直藏於該博物館。⁶此尊銘文首次出現是清光緒年間，除了《集成》以外，曾經著錄於《揆古錄》、《簠齋》、《奇觚室》、《綴遺齋》、《殷文存》、《鬱華閣》、《三代》、《總集》、《圖像集成》等資料彙編中。⁷至於其器影，早在 1911 年開始編印的《泉屋清賞》中已有公佈

⁶ 外山潔：〈泉屋博古館所藏工藝作品の蒐集時期とその特色について（1）青銅器・鏡鑑〉，《泉屋博古館紀要》第 27 卷（2011 年），頁 81-108。

⁷ 吳式芬：《揆古錄》（光緒年間刻本）、鄧實：《簠齋吉金錄》（鄧氏風雨樓，1918 年）、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1902 年成，1935 年刊）、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1894 年）、羅振玉：《殷文存》（上海：倉聖明智大學，1917 年）、盛昱：《鬱華閣金文》（1928 年序刊）、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羅氏百爵齋，1936 年序刊）、嚴一萍：《金文總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 年）、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彝 23)，後來又收入《海外》(圖 67)、《酒器 II》(圖 9)、《泉屋博古》(圖 78)等圖錄中。⁸由此可見，此尊及其銘文至少不是近代的偽作。同時，此銘的個別拓本和照片上可以看出比較明顯的「墊片 (spacer)」的痕跡，因此我們從銘文鑄造技術的觀點也可以肯定，A 尊銘文的鑄作年代應是先秦時期。⁹此外，近年從湖北隨州葉家山 27 號墓出土了如圖 7 所示的一件青銅尊。¹⁰此尊無論在形制、花紋上還是在器物大小和重量上，都與泉屋收藏 A 尊高度一致，而且其銘文內容也都是與「魚」族有關的。這一事實表明：這兩件器物製作的年代和地點應該是非常接近的。就是說，A 尊及其銘文至少不是後代的偽作。若此，偽造的自然也是 B 尊銘文。



圖 7

B 尊為日本京都小川氏舊藏，不知現在藏於何地。其銘文和器影照片在 1959 年刊行的《日精華》一書中第一次公佈。¹¹據此書說明可知，此尊器高 22.3 釐米，口徑 17.7 釐米，器腹下垂，圈足較高，通體呈現觶形。器腹下半和圈足分別飾有相向大鳥紋。如上文已指出，器物內底的兩行五

⁸ 參看《泉屋清賞》第 23 圖、《海外》第 67 圖、《酒器 II》(圖 9)、《泉屋博古》(圖 78)
⁹ 關於「墊片」和商周青銅器辨偽問題可參松丸道雄：〈西周青銅器製作の背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72 冊 (1977 年)。
¹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掘簡報〉，《文物》第 11 期 (2011 年)，頁 4-6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市葉家山西周墓地〉，《考古》第 7 期 (2012 年)；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年)。
¹¹ 梅原末治編：《日精華》第 2 冊，第 155 圖。

字銘文下層還有另一篇銘文的痕跡。梅原末治早就注意到這一現象，他在《日精華》說明中曾指出：「上層的『魚乍父庚彝』五字應是後刻的」。¹²梅原先生至少親眼觀察過此卣銘文，他對 B 尊銘文的看法應當受到重視。此外，《集成》的「尊類銘文說明」也曾經指出：「尊字倒，錯位於魚字下。銘與 05801（即 A 尊。筆者注）接近」，但對此銘的資料性質問題未作進一步的辨析，而且並未提及梅原末治對此銘的看法。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判定，B 尊上層的「魚乍（作）父庚彝」兩行五字銘文明顯不是原始材料，而是後來按照 A 尊銘文刻下來的偽作銘文。那麼，現在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就是：B 尊下層銘文到底是何物？

四、B 尊下層銘文的資料性質

我們首先了解一下 B 尊的器制特點。從器形、紋飾的基本特徵來看，B 尊的年代比 A 尊略晚，大約相當於西周中期早段（見圖 8）。¹³在西周早、中期的青銅禮器中，尊和卣是經常配套的，例如：次尊、次卣（《集成》05994、05405）、豐尊、豐卣（《集成》05996、05403）、效尊、效卣（《集成》05433、06009）等。這些配套器物通常帶有相同銘文，而其器形、紋飾特徵也互相相當一致。因此我們初步推測，B 尊也原來有可能與帶同樣銘文、同樣花紋的某一件卣形器物配套的。

¹² 梅原末治編：《日精華》第 2 冊，第 155 圖。

¹³ 關於西周早、中期尊形青銅器器形的演變過程請參看林巳奈夫：《綜覽》。圖 8 中器物圖像的來源均為林氏《綜覽》。



圖 8

那麼在下面，我們仔細觀察銘文的字形。B 尊下層銘文雖然殘泐嚴重、字跡不清，但去掉上層銘文後至少可以辨識出「[乍]寶尊彝」四字（見圖 9 上段右側）。此銘雖然內容簡單，但其中出現的寶字的字形結構很有特色，貝旁和缶旁形成上下結構（貝旁在上，缶旁在下），其旁邊似乎有一個玉旁，其下面則留空（另參圖 10-c）。值得注意的是，此寶字下的尊字沒帶阜旁，似是與上面寶字相連。如圖 10 所示，西周青銅器銘文中最常見的寶字一般作 a 形或 b 形，作 c 形的例子相當少見。¹⁴通過對寶字字形的全面比較可知，在以往西周金文材料中，屬於 c 形的寶字只出現過一次而已。那就是如圖 9 下段所示「作寶尊彝卣」（《集成》05126）中出現的寶字。

¹⁴ 參容庚編：《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516-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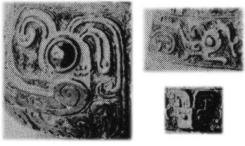
著錄	器形	花紋	銘文
B尊 日精華：2. 155 三代補：649 集成：5833 圖像集成：11561			 下層銘文摹本
作寶尊彝卣 綴遺齋：11. 16. 1-2 貞松堂：8. 14. 1 鬱華閣：230. 3-4 三代：13. 9. 3 (器) 三代補：771 總集：5191 (5268重) 集成：5126 圖像集成：12970			 器銘  蓋銘  摹本

圖 9

此卣器蓋對銘，銘文云：「作寶尊彝」一行四字。銘中出現的寶字似是寶、尊兩字合文，其字形結構和偏旁因素與 B 尊下層銘文中所見寶、尊兩字基本相同，只不過 B 尊銘文中的尊字離寶字的玉旁遠一點而已（另參圖 10 字形 d）。此卣的現藏單位又是日本泉屋博古館，其銘文除了《集成》以外，還著錄於《綴遺》（11.16.1-2）、《貞松》（8.4.1）、《鬱華》（230.3-4）、《三代》（13.9.3）、《三代補》（771）、《總集》（5191，5268 重出）、《酒器 I》（圖 21）、《泉屋博古》（銘文 30）、《圖像集成》（12970）等。其器影曾收錄《泉屋清賞》（彝 66）、《酒器 I》（圖 21）、《泉屋博古》（圖 99）等圖錄中。此卣通高 24.1 釐米，寬度 18.1 釐米，器、蓋分別飾有相向大鳥紋，紋飾的各個細節和造型風格均與 B 尊相當接近。此種大鳥紋提梁卣主要流行於西周中期，其年代也與 B 尊比較接近。綜上，此卣除了銘文內容和較特殊的寶字字形以外，在器物本身的風格和年代上也與 B 尊相當一致，而且此兩器均為清末民初時期傳入日本，其流傳過程也是比較接近的。考慮到這些，我們初步推斷：這兩件帶「乍（作）寶尊彝」銘文的器物原來是構成一對禮器的可能性比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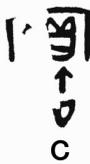
西周金文中常見的“寶”字	B尊下層“寶”字	泉屋藏卣“寶尊”合文
 <p>a b</p>	 <p>c</p>	 <p>d</p>

圖 10

五、相關器物銘文的考證

(一) 魚作父庚簋（方格乳釘紋無耳簋）

《圖像集成》(04164) 收錄如圖 11 (左一) 所示的銘文。銘文兩行五字，云：「魚乍（作）父庚彝」。我們一看就可以發現，此銘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字形、行款、佈局上都與上面所討論的「魚尊」銘文一模一樣，兩銘拓本又是完全可以重合的（見圖 11 右一）。通過上一節的討論，我們已經知道：A 尊銘文無疑是個真銘。那麼，按上一節中提出來的「銘文重合」的原則來講，此簋銘文應是偽作。為了檢驗我們對此簋銘所作的真偽判斷，下面將對此簋器物本身的特徵進行進一步的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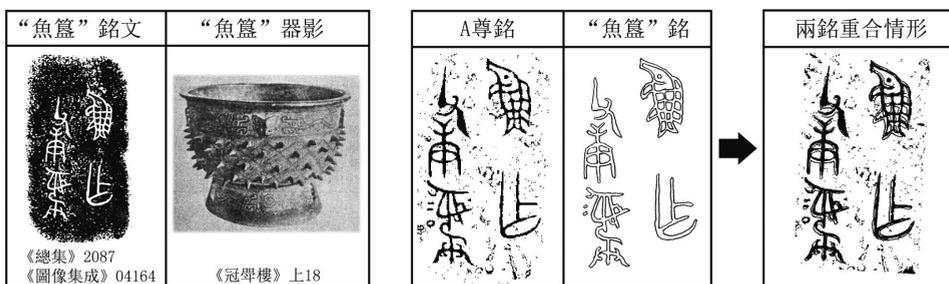


圖 11

《圖像集成》未收錄此簋器影，但通過對過去著錄情況的調查可以知道，其器影照片曾著錄於《冠罈樓》(上 18)，見圖 11 左二。此簋無耳，器腹飾方格乳釘紋，口沿下部和圈足分別飾夔龍紋。口沿平折，深腹。夔龍紋造型較為呆板。圈足較高略外侈，器壁較薄。關於這一類器物，日本

學者武者章先生曾經做過較全面的研究。¹⁵武者先生的研究表明：此類無耳方格乳釘簋的出土地點相當集中，大部份材料是從陝西岐山—寶雞一帶出土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類銅簋經常與所謂「高領袋足鬲」一起出土，而這「高領袋足鬲」學界一般認為是先周文化的標識性遺物。¹⁶眾所周知，先周文化就是武王克商之前的周文化，其年代可以理解為商末周初時期。那麼，此簋本身的年代明顯與「魚乍（作）父庚彝」銘文的年代不一致。而且，根據武者先生的研究可知，屬於這一類型的無耳方格乳釘簋一般不帶銘文，至少對考古出土的 30 多件材料而言，目前沒有一件帶有銘文的例子。¹⁷如此，我們從考古類型學角度也同樣可以肯定，此簋銘文是後代偽作。

（二）魚寢簋（重環紋盃）

此簋銘文在 1978 年出版的《彙編》中首次公佈，後收入《圖像集成》（04253）。器影曾收錄《綜覽》（小型盃 93），見圖 12。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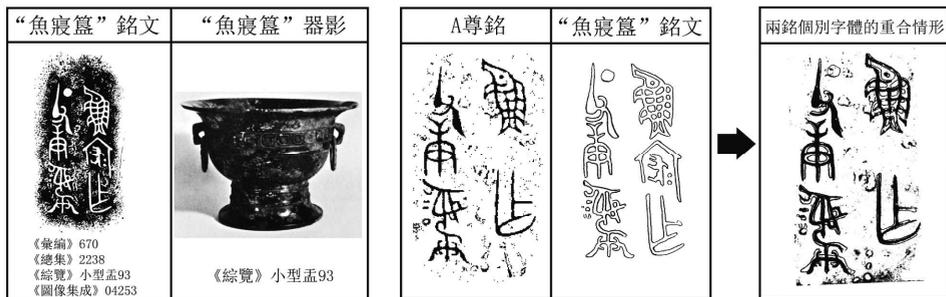


圖 12

此器器高 17.5 釐米，口沿外撇，通體呈盃形，深腹，圈足較高。器身飾一周重環紋，兩側各有一對銜環。關於器物年代，吳鎮烽、謝明文等學者認

¹⁵ 武者章：〈先周青銅器試探〉，《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109 冊（1989 年 3 月），頁 155-184。另參郭妍利：〈斜方格乳釘紋簋類型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歷史文物》第 3 期（2009 年），頁 46-59。

¹⁶ 雷興山：《先周文化探索》（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年）。

¹⁷ 武者章：〈先周青銅器試探〉。

¹⁸ 《集成》未收錄此簋銘，有可能是因為《集成》編者認為此簋銘文系偽作。

為是商末或周初，¹⁹但從器制和紋飾特徵來看，此盂年代明顯較晚，最早也不會早於西周中期。²⁰銘文兩行七字，作：「魚寢乍（作）丁父庚彝」。通過對銘文字形的仔細觀察可知，此銘除了魚字下的寢字以及父子上的丁字以外，其餘五個字的字形、大小、行款、佈局等特徵都與如上討論的泉屋收藏 A 尊銘文高度一致，互相基本可以重合（見圖 12 右一）。按照我們提出的「銘文重合」的道理來講，此盂銘文亦有可能是根據 A 尊銘文而作的偽銘。同時，我們已經知道 A 尊銘文年代大概相當於西周早期晚段，那麼，西周晚期的此盂銘文與 A 尊銘文能夠互相重合是一個明顯的年代矛盾。此外，從銘文詞例的角度來講，盂銘中所見的「魚寢」、「丁父庚」等詞語在西周金文語境中很難作出合理的解釋。鑒於以上的情況，我們似乎可以判定：此盂銘文也是按照 A 尊銘文而作的偽銘。

六、總結

（一）偽銘產生的時間和背景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如上 4 件有關「魚」的銘文中，除了泉屋收藏的 A 尊以外，其餘 3 件器物上所見的銘文均以 A 尊銘文為範本而刻下來的偽作。在表 1 中，我們將每一件器物銘文的著錄情況按照年代順序排列出來，以便討論偽作銘文的產生時間及其相關問題。從表中可知，最早出現的是 A 尊銘文。此銘是從清末以來反復被著錄，可以肯定是真器真銘。其次出現的是「魚簋」偽銘，由於此偽銘是在《三代》（1936）中首次出現，可知此偽銘產生年代不會晚於 1936 年。有可能是根據《攬古錄》（1850 年後）、《殷文存》（1917）等較早出版的金文著錄書中公佈的 A 尊銘文拓本而作的偽銘。到了上世紀 50 年代以後，先後出現 B 尊上層偽銘和「魚寢盂」偽銘。遺憾的是，關於 B 尊上層銘文的偽作年代我們目前未能找到足夠的線索，但就「魚寢盂」而言，由於此銘將 A 尊銘文中能看到的墊片痕跡誤當作文字筆劃刻下來，據此我們可以推斷，此偽銘是根據《鬱

¹⁹ 吳鎮烽：《圖像集成》第 9 冊，頁 27，04253「寢魚簋」；謝明文：《商代金文的整理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年），頁 210，163「魚家簋」。

²⁰ 此類兩耳呈銜環形的高圈足盂形器物流行於西周晚期。參林已奈夫：《綜覽》圖版頁 147「小型盂」92、93、94。此外，該器器腹所見的「重環紋」主要流行於西周晚期，其年代不會早於西周中期。參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577。

華閣》(1928)、《三代》(1936)等書中收錄的較清晰、能看到墊片痕跡的銘文拓影而製作的可能性比較大。若此，此偽銘的產生年代最早也不會早於192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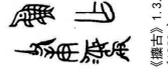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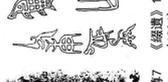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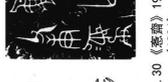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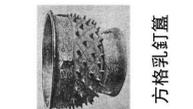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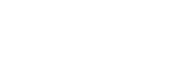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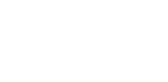
(二)「銘文重合法」對青銅器銘文辨偽研究的有效性

如上所述，在東周之前的鑄造銘文資料中基本不見互相完全可以重合的例子。本文從這一現象出發，通過對西周金文材料的個案研究指出：此種「銘文重合法」是對東周之前的鑄造銘文辨偽、校重以及史料批判工作十分有用的。除了如上討論的器物銘文以外，我們利用「重合法」可以發現更多的偽作或重複著錄銘文，例如：婦闕卣(《集成》05349、05350，兩銘為重複著錄)；²¹壬冊父丁爵(《集成》08322、08910，兩銘為重複著錄)；戈車尊和戈車卣(《總集》4768、《集成》5272.2，前者應是偽作)；亞矢望父乙卣(《集成》05206、09565，兩銘為重複著錄)；以及師趁鬲和師趁鼎(《集成》00745、02713，後者應是偽作)²²等。由於本文篇幅有限，對這些材料未能展開全面討論，但我們相信，通過如上的討論「重合法」的可行性已經能夠得到充分的證實。

²¹ 崎川隆：〈婦闕卣銘文拓本的重新整理〉，《古文字研究》第30輯(2014年待刊)。

²² 關於師趁鼎，張亞初、何樹環等學者認為是真器真銘。可參張亞初：〈殷周青銅鼎器名、用途研究〉，《古文字研究》第18輯(1992年)頁273-315；何樹環：《青銅器與西周史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13年)頁117-120。但通過器物照片的仔細觀察可知，此鼎器形略呈豎長，圓底、高柱足，其器形特征根本不符西周中、晚期鼎形器的基本形制。因此，我們認為此鼎有可能是後世偽作，其銘文應是根據「師趁鬲」銘文而作的偽銘。

表 1

器影	銘文拓本著錄情況 (按公佈年份排列)											
 A尊 (泉屋藏)	 《御志》1.3.23 (1850+)	 《漢書》1.第7 (1850+)	 《續漢》17.30 (1894)	 《藝文》19.5.2 (1896)	 《奇觚》5.5.3 (1902)	 《勳文》上23 (1917)	 《續華》187.3 (1928)	 《三代》11.18.6 (1936)	 《集華》4701 (1983)	 《集成》05801 (1984-94)	 《酒器》2.9 (1994)	 《圖像集成》11560 (2012)
 B尊 (小川藏)	 《日精華》2.155 (1959-64)	 《三代補》649 (1980)	 《集成》05833 (1984-94)	 《圖像集成》11561 (2012)								
 方格乳釘簋	 《三代》6.27.6 (1936)	 《殷禮》上18 (1947)	 《總集》2087 (1983)	 《國史金》1514.1 (2004)	 《圖像集成》04164 (2012)							
 重環紋孟	 《集編》670 (1978)	 《總集》2238 (1983)	 《總集》小型高93 (1984)	 《總集》04253 (2012)								

引書簡稱

- 《攬古錄》……吳式芬：《攬古錄》，光緒年間刻本。
- 《奇觚室》……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1902年成，1935年刊。
- 《綴遺齋》……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1894年。
- 《殷文存》……羅振玉：《殷文存》，上海：倉聖明智大學，1917年。
- 《簠齋》……鄧實：《簠齋吉金錄》，鄧氏風雨樓，1918年。
- 《泉屋》……濱田耕作：《泉屋清賞彝器部》，京都：住友氏刊，1919年。
- 《鬱華閣》……盛昱：《鬱華閣金文》，1928年序刊，後收入《金文文獻集成》第15冊，2004年。
- 《貞松堂》……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1931年。
- 《海外》……容庚：《海外吉金圖錄》，北京：燕京大學考古學社，1935年。
- 《三代》……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羅氏百爵齋，1936年序刊。
- 《冠甬樓》……榮厚輯，梅原末治修訂：《冠甬樓吉金圖》，京都：小林氏影印，1947年。
- 《日精華》……梅原末治：《日本蒐集支那古銅精華》，大阪：山中商會，1959年—1962年。
- 《彙編》……Noel Barnard 巴納、張光裕：《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年。
- 《三代補》……周法高：《三代吉金文存補》，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80年。
- 《總集》……嚴一萍：《金文總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
- 《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綜覽》……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一》，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年。
- 《酒器Ⅰ》……樋口隆康編：《酒器Ⅰ》，京都：泉屋博古館，1994年。
- 《酒器Ⅱ》……樋口隆康編：《酒器Ⅱ》，京都：泉屋博古館，1998年。
- 《泉屋博古》……泉屋博古館：《泉屋博古・中國古銅器編》，京都：泉屋博古館，2002年。

《圖像集成》……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主要參考書目

專著

Noel Barnard 巴納：“A Lid Core with Intaglio Inscription; and a Re-appraisal of Methods of Casting Inscriptions”, Appendix A, *The Shan fuliangch'iKuei and Associated Inscribed Vessels* 《善夫梁其簋及其他關係諸器研究》，SMC Publishing Inc, 1996。

期刊論文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掘簡報〉，《文物》第11期，2011年。

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

Li Feng 李峰：“Ancient Reproductions and Calligraphic Variations: Studies of Western Zhou Bronzes with ‘Identical Inscriptions’”〈古代的複製和書體的變異——西周同銘青銅器研究〉, *Early China* 22, 1997。

吉開將人：〈曾侯乙墓出土戈戟の研究〉，《東京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研究紀要》第12號，東京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1994年。

吉開將人：〈先秦時期における單字模鑄造法について—曾侯乙墓出土青銅器群を中心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9冊，1995年。

林巳奈夫：〈殷周青銅器銘文鑄造法に關する若干の問題〉，《東方學報》第51冊，1979年。

武者章：〈先周青銅器試探〉，《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09冊，1989年3月。

學位論文

謝明文：《商代金文的整理與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6月。